



列 宁
怎 么 办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怎 么 办？

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

中共中央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这次排印第二版时，译者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订。

列 宁
怎 么 办 ?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 插页 2 · 字数 136,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2版
1965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462 定价（四）0.52元
印数 42,001—99,000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6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6
(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10
(三) 俄国的批评派	15
(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22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8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29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33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42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52
(一) 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53
(二) 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63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66
(四) 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72
(五) 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75
(六) 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91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94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95
(二) 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99
(三) 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106
(四) 组织工作的规模	121

(五) “阴谋”組織和“民主制”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二) 報紙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三) 我們需要什么样式的組織?	1
結束語	1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統一的嘗試	1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1
注释	18

怎 么 办？

我們运动中的迫切問題¹

“……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摘自拉薩爾 1852 年 6 月
24 日給馬克思的信)

写于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1902 年 3 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7 年
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文集的
原文作过校订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計劃，本书的任务是要詳細發揮“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一文^①中所發表的那些思想。我們应当首先向讀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許的諾言（这些諾言在答复許多私人詢問和信件時也一再重複過）履行得太遲了。這樣遲緩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間曾經試圖把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組織統一起來。當時自然應當等待這次嘗試的結果，因為這次嘗試如果成功，我們也許就要從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火星报”對於組織問題的觀點；無論如何，這樣的成就可以保證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黨內存在兩種派別的現象。讀者知道，這次嘗試結果失敗了，而且，正像我們在下面將要竭力證明的那样，“工人事業”雜誌在第10期上重新轉向經濟主義以後，這次嘗試也不能不失敗。同這個模糊不清，缺乏明確性，但因而也就更為牢固並能在各種形式下复活起來的派別作堅決的鬥爭，已經是絕對必要的事情。因此本書的原定計劃，也就有所改變並且大大地擴充了。

本書的主題，本來應當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的政治鼓動的性質和主要內容，我們的組織任務，在各地同時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組織的計劃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早已感覺興趣，還在一次試圖使“工人報”復刊（歷次嘗試都沒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有成功)的时候(見第五章),就想在这个報紙上提出這些問題了。但是,原定計劃,即在本書中只分析这三个問題,并且尽可能用正面敘述方式說明自己的觀點,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論戰方式的計劃,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而根本无法實現。一方面,原來經濟主義比我們所設想的要頑強得多(我們所用的經濟主義這個詞是廣義的,在1901年12月“火星報”第12號上發表的那篇可以說是定出了本書大綱的“同經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的文章已經說明這一點^①)。現在已經很明顯,对于解決这三个問題所以存在着各種不同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两个派別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什么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主義者看見我們在“火星報”上實際宣傳我們的觀點而表示茫然不解,這顯然說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講各的話,如果我們不ab ovo^②講起,便什么也不可能講清,所以必須作一次嘗試,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證,來就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一切根本之點,向一切經濟主義者作一番系統的“解釋”。于是我就決定作这样一次嘗試,來“解釋”一番,雖然我明明知道,這會使本書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遲,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別的辦法,來履行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許的諾言。所以,除了為出版遲緩致歉之外,還要為本書文字修飾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寫作,而且經常被其他各種工作所打斷。

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分析,仍然是本書的主題,但是我不得不從兩個比較一般的問題談起:為什麼像“批評自由”這樣一個“無害的”和“正常的”口號,對我們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戰鬥的信號?為什麼我們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對於群眾自发運動的作用這個基本問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80—287頁。——編者注

② 从头。——編者注

題上都談不攏？其次，本来是要叙述我們對政治鼓動的性质和內容的观点，現在則變成了說明工聯主義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本来是要叙述我們對組織任务的观点，現在則變成了說明經濟主义者認為滿意的手工业方式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的革命家組織之間的區別。再次，人們用來反對全俄政治報“計劃”的意見越是沒有根據，人們越是不從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問題，即我們怎樣才能在各地同時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組織的問題，我也就越是要堅持這個“計劃”。最後，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幾點：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來防止同經濟主义者完全決裂，但是這一決裂畢竟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工人事業”雜誌已經具有一種特別的、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作用，因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現出來的不是徹底的經濟主義，而是那種構成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整個時期的特點的混亂和動搖；所以我們同“工人事業”雜誌進行的初看起來似乎是過分詳細的論戰也是有意義的，因為不徹底結束這個時期，我們就不能前進。

尼·列寧

1902年2月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间，有人声称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像外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

① 我要顺便说明一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²之间，盖得派与可能派³之间，费边社分子⁴与社会民主派之间，民意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个别国家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在这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也许会充分地巩固起来，足以消除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

两个派別，这两个派別之間的斗争，有时熾烈起来，火焰騰騰；有时又靜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決議”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馬克思主義采取“批評”态度的那个“新”派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伯恩施坦已經十分肯定地讲明，米勒兰已經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为头头是道的“新”論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論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貧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資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終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論，认为这个理論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們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轉向資產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轉向用資產阶级观点来批評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許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批評；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統地受到了这种批評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評”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納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①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別，按其內

① 此典出自罗馬神話，丘必特是掌管众神的最高之神，密納发是手艺、科学和艺术、教师和医生的保护之神。相传密納发女神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鎧甲、手执宝劍。因此，人們常常借此來比喩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譯者注

容來說，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資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論批評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末法国人已經設法把“新方法”具体表明了。法国在这一次也证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历来的名誉，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結局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彻底”。（見恩格斯为馬克思的《Der 18 Brumaire》^①一书写的序言）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談什么理論，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們能够立刻轉到有其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絕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馬尔都来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对他大加贊賞了！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的勇气，那末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資产阶级內閣，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統治，那末社会党人閣員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詞来博得整个資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經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諦之后，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向那目前恰好被法国社会党人叫做絞架、鞭子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专家的沙皇致賀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敗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識——这种社会主义意識是保障我們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只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听起来頗为响亮的草案，这种改良真是微

① “雾月十八日”⁵。——編者注

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些！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相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像那个空桶的寓言了①。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道：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

① 贝克雷洛夫寓言“两只桶”。这个寓言讲有一辆车子运两只桶，其中一只空桶，一路上晃晃荡荡，响声刺耳，弄得路人唯恐避之而不及。——译者注

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认为你們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帮助你們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們放开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評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評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論定理，而是当做政治要求，即为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組織統一起来”这一問題而提出的。它說：“要达到坚固的統一，就要有批評自由。”（第36頁）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确定的結論：1.“工人事业”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杂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活动的自由。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这两个結論。

“工人事业”杂志“特別”不喜欢的，就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爱作預言，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必将决裂”^①。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做十八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見于“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論。这篇社論的作者是普列汉諾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无题派”⁶或孟什維克，至今都很爱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諾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現在人們却宁願默不做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編者注）

“工人事业”杂志編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們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說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馬克思主义者筆下写出这样的話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以想像的那样，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派別，包括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頁）

好一个大胆的断語！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見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們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定說“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级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說法，是没有拿出任何論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大概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关于自己所讲的話，那末他的断語也就无須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別时竟以該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話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他随后所說的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絕對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說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頁），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嗎？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完全的批評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他們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的害处”。

我們对此回答說：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簡直是“按伊洛瓦斯基⁷方式”来观察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人的意見，要解释德国社会党的一致和法国

社会党的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征，不必把軍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議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經濟生活以及經濟发展的情况拿来对比，不必提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論上的錯誤（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②），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錯誤（拉薩尔）的斗争——同时发生的事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法国人互相爭吵是因为他們不肯容忍；德国人彼此一致是因为他們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极端深奥的議論就“避开了”一件事实，一件完全推翻了維护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言論的事实。伯恩施坦主义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場上，对于这个問題只有历史經驗才能給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義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曾經在自己的德国同道們的热烈贊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贊助下——參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頁），試圖独自 站稳脚跟。这种援引法国人“不肯調和”的言論，除掉有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于杜林的观点的，当时他們在党代表大会上甚至紛紛公开地責备恩格斯，說他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态度进行爭辯等等。莫斯特和他的同志們提議（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Vorwärts》（“前进报”。——編者注）上不再登載恩格斯的論文，认为这些論文“絕大多數讀者都不感到兴趣”；而瓦耳泰希（Vahlteich）則說登載这些論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說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有貢獻的，“我們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大学教授們要彼此爭論，那末‘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爭論的場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們看，这也是維护“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